

##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乱象分析

范玉刚

**提 要** 文化遗产是文化传统展示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脉的显现,其内涵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资源之一。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在文化大视野中给予合理定位。由于当前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不匹配等原因,导致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乱象丛生。

**关键词** 文化观念 文化遗产 保护与开发乱象 文脉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现代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文化遗产保护遭遇了极大冲击和挑战,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已成为社会经济全面和谐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过度开发。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如何协调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与文化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保护民族的文化根脉,不仅是一个理论创新的理念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操作问题,其中地方政府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担负着重要责任。本文通过对当前历史语境下某些乱象的剖析,在学理上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知。

—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当前的乱象既有观念问题,也有现实操作问题。首先在理念上对为什么要保护缺乏深刻理解,往往在保护中专注单项意义,尤其是凸显文化价值而忽略多维意义。殊不知,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历史场景的化石和既往文明历程的生动记录,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作为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对增强文化认同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此外,还有维系文化传承的教育功能和满足文化多样性差异的审美价值,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价值。如果仅着眼于单项价值,忽略文化遗产的多重属性,就会对文化遗产的多维价值有所忽视,进而影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认知和自觉性。观念的偏颇导致实践中对保护什么,缺乏全局意识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以至于在保护中出现保护数量过滥、重点过散的乱象。导致一些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应当保护的项目,一些面临生存传承危机亟需保护的项目,难以做到及时重点保护。这既有现实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原因,也源自学术研究不够深入。因此,保护什么既要与文化体制改革关联起来,也要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研究与保护相互促进,互为前提,保护的内容要体现时代意识和文化进步,谨防把不应保护的项目和内容列入保护规划。在实践中,要警惕以下乱象。

学术研究乱象:受经济至上思维的影响,不断遭遇地方经济“绑架”的学术研究,逐渐

置科学精神、学术规范和学术良心于不顾,而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在考古等文化遗产保护尚未有权威结论的情况下为地方经济鸣锣开道!学术研究打着公器的幌子,完全为利益所诱、迎奉屈就!譬如,在“曹操墓”事件中,地方政府积极热衷是经济效益使然,试图借曹操之名获利,不足为怪。但其中一些学者和学术机构积极“发言”和充当急先锋,实在有违学术尊严,这种学术不端,必会影响学术和学科的发展,其后果不堪设想。这关乎市场经济条件下,学者如何坚守良心和道德底线,不为利益所诱的大问题。学术研究面向现实、面向民间,为经济发展服务,但要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评判能力,要有一种超越意识和公益精神,要以学术为社会为文化遗产保护树立一道标杆。

市场乱象:这种无序最引人瞩目和引起社会非议颇多。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旅游发展相结合,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条路经,虽然有一些成功范例,但市场逐利的逻辑和偏于经济维度的短视行为,往往出现背离初衷的本末倒置现象。殊不知,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决不是单纯推动地方旅游业发展,以及为了做大文化产业。对文化遗产资源,合理开发的前提是科学保护,不能舍本求末,不能为追逐旅游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破坏综合效益。当下,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开发文化遗产的旗号,以GDP的名义绑架了文化遗产,在市场开发中乱象滋生。譬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过度商业化的运作,大拆大建的开发,往往造成传统空间、生活肌理及其历史文脉的割裂,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在市场效应的引诱下,类似乔家大院的经历凸显了文物保护与地方政府商业化冲动之间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的强势导致一些开发乱象的轮番登台。在功利主义思潮或“政绩观”下,政府过热或者权力介入过多,不仅劳民伤财,还使保护城市历史和实现城市发展似乎变得“水火不容”。让城市历史处于经济发展的从属地位,让前者在后者俯视下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关键是如何建构一套独立的有别于市场价值的评估体系,是保护为主还是商业开发为主?即使“双赢”也要有规矩有限度守惯例,否则越雷池半步的损失不可估量。如平遥古城墙坍塌、内乡县衙、水洗“三孔”、镇江宋元粮仓遗址、安徽泗县释迦古寺等因商业开发的系列被毁事件。

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流变性关系失察乱象:在二者的关系中,既不可机械地强调“真实”,绝对地排斥“流变”;也不能以不合理、非正常的“流变”破坏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模仿再造“假古迹”,假冒编造“伪民俗”。当下,借助一些所谓的传说编造假古迹的事件不断出现,“拆毁真文物,制造假古董”的乱象一度泛滥。假古董的泛滥不仅侵蚀、掠夺、浪费资源,还损毁一个区域的文化生态,破坏了文化传承与文化积累。一些决策者热衷于在城市记忆的载体上建造新的景观,大批用现代材料、工艺堆砌起来的仿古建筑群招摇过市,这些主观意志的景观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譬如,由众多传统街道改造而成的“汉街”、“宋街”、“明清一条街”等,不仅使独具特色的历史街区沦为失去真实价值和历史信息的“假古董”,还引发了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之乱象频仍。

文化遗产保护在坚持“真实性”前提下,除博物馆化,更重要的是让它活在民间,当下大批古镇、老街、村落、民居在旅游的旗号下被重新整修得富丽堂皇,但却失去了原有的文化韵味,甚至有些地方将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居民全部迁出,把民居改为旅游休闲设施,使历史文化街区失去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即失去了“生活真实性”。这种以表演性仿古活动来代替依附在这些历史场所里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另一种造假行为,所谓应旅游征召而来的“历史文化街区”失去了本真的历史韵味,根本不是合乎历史逻辑的流

变。甚至有的以流变性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极大地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以至于有些刚被确定为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保护工作尚未正式启动,就被旅游市场片面地开发和利用,原生态的歌舞被时尚的审美趣味加以改造、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技艺被机械取代、古老村落被开发成喧嚣的旅游区等,造成了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这种破坏多是对文化遗产本体的破坏,如对遗产的原型、材料等不負責任的开发。

## 二

文化遗产保护乱象的滋生,除了认识不到位,保护意识薄弱,认为保护比新建麻烦、花费多,政绩不明显;立法滞后,法规不健全等原因外;最主要原因是遭遇当前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挑战。城市化大规模建设,尤其是经济至上思维模式的惯性,与文化遗产保护产生矛盾和冲突。一些地方政府认为保护文化历史遗存与土地开发的利益冲突较大,以发展经济为名去迎合开发商,缺乏历史眼光的开发导致文化遗产屡遭毁损。近年来,“拆”字似乎成了不少城市中一道刺目的景观。“拆”使多少历史文化街区遭到灭顶之灾,“拆”字使多少历史城区丧失了传统肌理,“拆”字使多少历史性城市失去特色风貌。因此,“拆”字在冯骥才先生的眼中成了“二十年来中国城市中最霸道的一个字”。“拆”使城市发展割裂了延续历史的脉络、遗失了历史记忆、迷失了发展方向,城市成了豪华、冷漠的现代的钢筋水泥的堆积,哪里还能找到归家的路?

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失衡,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以经济取向为主导,表现为重“今天”轻“昨天”、重申报轻传承、重商业开发轻后期管理。发展是硬道理被地方简化为发展经济是头等重要大事。现实经济利益的诱惑、改善人居条件的渴望,发展经济在一些地方成为唯一或者是硬目标。在此境遇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非常复杂的利益博弈。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缺乏必要的维护经费,导致文化遗存周遭地区基础设施落后,无形中放任了对文化遗产的毁损;或者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文化遗产保护要给经济建设让路。因为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可能真正有效保护文化遗产,地方要发展,要改善经济条件,使文化遗产保护境遇尴尬。同时,发达地区已完成发展积累驶入了又好又快的轨道,采取全国一刀切的保护政策,无疑会使某些地方政府感觉政策不公平,在制度安排上文化遗产保护很难被提到政府工作的重要层面。结果:政策的不公平成为最大的不公平;制度的不到位成为最严重的政府不作为。特别是囿于执政水平和文化理念的原因,在一些地方“发展是硬道理”成为破坏文化遗产的最好理由(掠夺性开发),文化遗产保护和商业开发之间的关系一旦失衡,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全国而言,应该由国家主管部门、职能部门统筹管理,或者设专项资金或者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要尽可能与当地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的要求相适应,要拓展思维开阔视野,逐步改变文物保存越多负担越重,老百姓的生活就越难以改善的现状。

其次,乱象的滋生源自未能协调好文化遗产权属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文化遗产的权属如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含使用权)在现实中的情况很复杂,这里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历史遗存问题。现实境况是:破烂失修的文物无人问津(该保护的无人过问),炙手可热的文物多方争夺管理权(抢夺经济利益)。文化遗产真正所有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国家、公民个人的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缺乏一套有效的协调各

方利益关系的机制,首先是体制障碍的破除和机制创新。

再次,乱象滋生也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低俗化倾向相关,低俗化蔓延背离了文化发展提升的原则。为了吸引眼球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主观上增加很多人工赝品,凸显娱乐性,迎合社会上“娱乐至死”的低俗化倾向。一是打着传承名人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里,表面看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实际上是竞相争抢经济利益,名人故里之争中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已然将文化遗产商品化。二是造假文物,对文化遗产进行不恰当的商业利用和运营,过度的商业炒作和破坏性开发,使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三是盲目举办祭拜活动,缺乏严肃性,造成传统文化内涵被严重扭曲。四是有的地方肆意炒作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人物和文艺形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把一些文化垃圾当作文化遗产招摇过市,致使一些文化真相在互相倾轧中变得混乱不堪、文化尊严在无序竞争中失去分量。这种恶俗的乱象招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发文制止。要求各地在对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等进行合理适度开发利用时,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对文化遗产内涵的肆意歪曲和滥用。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进行科学甄别,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参与进行认定。对于有争议的、未经认定的,不宜命名或宣传。严禁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反面或负面的人物形象建设主题文化公园、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等。为保证命名的严肃性,各地不宜对文艺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进行命名故里等活动。

### 三

文化遗产保护首先要明确两个主体: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明晰各自的定位和职能。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应直接参与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因此不能过于强势,要有所限制,否则就在制度安排上出现失误,而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成灾难性破坏,但要谨防出现保护主体弱化和保护机制虚化问题;政府不但要增加政府投入,还要调动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在传承中谨防传承主体老化和传承机制僵化(后继乏人、代际失传)问题。这非常现实,因当前农村人口空洞化、空巢化,传承人多是一些50岁甚至70岁以上的老人。只有明确职责定位,才能明晰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

公益性原则:文化遗产承载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现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财产,像水、空气和基础设施一样,应该为民众所共有。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公益性事业,按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者,政府是保护主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政府必须花钱保护文物,要加大财政投入,加大经费保障(包括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同时,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要依靠民众,民众是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也要惠及民众,这是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实需要,也是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如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增强服务意识、完善服务设施、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着力改善群众居住和生活条件,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尤其在以文化遗产为内容的文化产业发展中,要把当地人的收益特别是本土群众的经济收益列入文化产业的评估体系中。文化遗产不应将自己封闭起来,孤立于社会之外,而要让文化遗产走入民间,进入生活,政府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使更多的民众接触文化遗产,让其历史气息、文化氛围为人们带来愉快、熏陶和启迪。营造保护文化

遗产人人有责、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社会环境,形成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舆论氛围。诚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言:只有当地民众自觉、倾心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有强盛的生命力。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中,必须尊重和维护人民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让遗产不断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使其生活得美好有趣味。在民众中普及“大文化”、“大旅游”的观念,鼓励市民的参与,激发其认同意识。

**效益原则:**文化遗产作为多维价值的载体,在保护和开发中要充分发挥社会效益、综合效益、兼顾经济效益。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美化城乡面貌、提升地域形象和知名度、彰显地域魅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尤其是提升旅游产业附加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开发、延长产业链等方面文化遗产作为内容环节的开发大有可为,它可以刺激消费拓展新市场,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发展的“包袱”,既要解放思想合理开发,又要谨防过度开发。注意把握文化遗产向文化资本、文化产权、文化产业转化过程中的科学性和限度,防止以“经济至上”的思维方式过滥、过度开发文化遗产资源。以先进的理念推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探索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载体和通道,即文化资源转化为资本、产权,文化产品转化为商品,符号资源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形成文化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延伸和完善产业链,以内容和附加值的提升来兑现文化遗产价值。如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丽江模式”,经由同心圆效应,使丽江的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特色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文化遗产保护的效益原则是综合性的,“赚钱”只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副产品”,但有些地方采取文化遗产保护无条件与旅游开发对接,所有出发点都从“市场”、“产品”、“品牌”等商业逻辑出发,并用市场化的商业逻辑进行实施和解释,这种凸显经济维度的做法背离了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效益原则。在文化来临的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效益原则需要从大文化视野来领会,文化遗产的价值即使有产业维度,也是处于产业运作的上游即内容环节的开发。

**整体性原则:**在保护理念上,文化遗产的保护既要强调文化遗产主体,还要把保护范围延伸至外部环境,甚至强调保护并延续历史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已从简单的点面保护,过渡到大型文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甚至提出建立文化生态区,予以整体性的保护和开发的理念。在宏观上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改善环境结合起来,不仅注重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还要关注对文化遗产依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模式,既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比如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都列入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之列,其理念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注重各种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还要关注文化形式赖以显现的周遭环境——文化空间。时下,一些原本风光秀美、具有浓郁文化底蕴和人文价值的古镇,在旅游业超负荷的开发下,原本集居住、商贸于一体的历史文化街区,逐渐演变为纯粹的商贸旅游区,丧失了历史街区的原真性,尽管有历史遗迹存在,但依旧遮蔽了文化遗产的价值。因为当下的历史街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讲述的是一个“现代故事”。生活方式的消失,使传统建筑成为没有灵魂的文化空壳。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改变,特别是过渡的商业氛围,破坏了该地区整体风貌的和谐。如秦始皇陵遗址内开辟了数千平方

米的现代广场,尽管随后因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拆除了一些仿古建筑,但其后又在保护范围内大兴土木,修建旅游设施,平日里陵区内旌旗招展,严重破坏了秦始皇陵的完整性和文化内涵的真实性。因此,文化遗产保护要注重整体性,注重具体遗产项目的保护,也要注重特定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如果保护项目过细、过于孤立,既激化资源权属的争夺、分割了文化存在的整体感,也不利于同类保护对象的整体传承和统一保护。说到底,要以文化的方式保护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中要有所创新。

交流原则: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既是古老文明与当代文明,以及与未来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包括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如四川成都附近的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保护,就是意在凸显文明的对话意味。在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人们偏于对文化遗产资源权属的争夺(背后是经济利益),而对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深刻内涵以及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对实现传承式、交流式的文明对话的目的重视不够,忽略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交流对话对于文明发展的意义。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在深层次上旨在加强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这样才能更加凸显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才能愈加凸显不同区域的特色。

“活态化”原则:文化遗产是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历史记忆符号,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在保护中通过某种价值导向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化遗产地和博物馆一样,都是利用文化遗产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历史、艺术和科学知识等方面教育的重要场所。文化遗产保护除了博物馆化,最重要的保护方式是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光大,使其以活态化的方式显现。如丽江古城就是一座活着的城市。去丽江最深刻地感受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如休闲、发呆的感觉,一种回归的感觉。丽江古城至今还有许多百姓按照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生活;东巴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东巴还在用东巴文进行读写;纳西古乐是音乐的活化石,至今仍在演奏曾经消逝的唐宋之声;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奇特的阿夏婚俗,是活着的母系氏族生活方式。丽江保护的是一种活着的生活方式,一种对游人有着吸引力的生活观念,这种观念成全了游人的梦,而且能把梦带走、广泛传播。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化”原则还表现在通过挖掘文化遗产的深刻内涵,经由现代阐释使之融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成为主流文化中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部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和创新作贡献。

#### 四

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要解放思想,拓展视野,转变观念,还要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制度层面建设。鼓励引导社会资金主动、自愿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中,逐步探索引入有责任感有实力的企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如通过税收杠杆,鼓励企业或公民个人投资文化遗产保护,同时使投资人得到社会声誉及经济效益。底线是文物保护仍由政府主导,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有绝对发言权,企业并不从文物本身的直接利用上获取回报,而是通过遗址公园建设带来的遗址所在地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品位的提高,带动周边地价的大幅提升获取收益。以及通过下游产品的开发来延伸产业链,或者通过符号授权开发新产品。像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公园的开发等都是这种商业运作模式,取得了不错的社会、经济效益。如

开封根据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建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就生动再现了东京汴梁城市井生活的繁华场景,把无形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有形的文化符号,获得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表明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形式并不是文物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的关键,关键是要有一套符合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有效体制和机制,并由懂行的、具备强烈法制观念、正确文物保护理念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操作者来操作。

通过学术研究深刻挖掘文化遗产的内在关联性、逻辑性和层次性,在文化环境中合理开发其产业维度,探索保护与开发模式的创新,在保护的基础上引进社会资金,通过有效开发提升旅游中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像丝绸之路、安阳殷墟遗址、洛阳隋唐洛阳城遗址、西安大明宫遗址等通过保护和有效开发,已经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惠及民众的事业。依托文物进行旅游开发、馆藏文物复制品及相关服务、特色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营等,已成为一些地方的支柱产业。如湖北武当山文化旅游特区、河北山海关区、云南丽江古城等旅游开发,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市博物馆的复制品,湖北省博物馆的编钟表演、河南省博物馆的古乐表演、武当山的文化表演等均丰富了参观游览的内容,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有效地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升级。在对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等进行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时,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对文化遗产内涵的肆意歪曲和滥用。加强保护理念的宣传和普及,努力传播科学的文化遗产知识,使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自觉,在源头上杜绝城市发展中的短视行为。在管理方式上可考虑实行文化遗产保护准入制度,实施从业资格管理,使文化遗产保护正规化、长效化。

展望未来的社会形态,在文化时代的来临中定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随着产业的下游化和人的需求的上游化,以及社会形态的高端化,文化生产与消费将成为未来社会主要的经济形态,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引擎”。就经济发展而言,许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城市,由文化遗产带动的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文化遗产在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平衡中担负重要的支点功能,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在新形态的社会发展和城市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同时代精神一起,成为人们衡量城市精神、城市品位的重要标准。文化遗产在社会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精神层面讲,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是无法用简单的经济社会尺度来衡量,文化遗产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而又深刻长远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复制但可多层次开发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更是当前国家和民族形象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具有意义增殖的象征资本。文化遗产滋养着现代科学、教育和文化,是民族自尊和获得国际尊严的力量源泉,作为软实力的内容之一,它会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凝聚着该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了该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离不开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抛弃传统,割断文脉,就会迷失自我、丧失根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传承下来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如文物、典籍等,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说、传统艺术、民俗活动、节庆仪式、民间工艺等。这些文化遗产显现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审美理念,是文化传统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文脉的主干,所谓文脉就是一个民族代代传承的

文化魂魄,它代表着文明演进的方向。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文化根脉。无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一个时代文化结晶的文明成果,都凝聚着时代的精神精华和人类的智慧。文脉随着人类一代代的繁衍被延续保护下来,留存发扬,以教化天下,泽及四海。经过漫长的熏陶浸润,逐渐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灵魂。它超越了时空、民族、国家和人种,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如果一个时代没有代表其文明的物质成果,文脉就失去了依存的载体,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没有其象征;如果现代文明没有代表文脉的哲学、文学、艺术成就,所谓文明就是一堆没有灵魂的器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个民族的灵魂之所以不灭,就是因为其文脉绵延不绝。所以,一个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交相辉映,相互衬托,才是完美的文明,才是和谐的社会。文脉是一个民族的魂魄,从根本上说,更像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一个没有文脉的民族,就像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防,是注定要灭亡的。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脉,在各种文化的激荡和碰撞中就会被拥有高位态文化的更强盛的民族所融合和同化。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千万年而不绝,就是因为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中华文脉没有枯竭。<sup>①</sup>

文化遗产的保护,说到底,不仅仅是保存历史遗迹以满足人们对昔日文化的怀念,追溯过去苍老的往事,更是为了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延续我们的文化甚至生活本身,使今天和此后都能触摸到传统文化“不能消失的未来心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我们归家、返乡的踪迹。我们要时时依循、呵护它。

(作者通讯地址 范玉刚 北京:中央党校文史部 100091)

(责任编辑 晓 思)

---

<sup>①</sup> 参阅国风:《文脉是一个民族的魂魄》,《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26日专题版。